一、走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头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迅速强占我国东北,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过程。

“九·一八”事变后,最先觉醒、反应最强烈的是广大青年学生。众多的大中学生,政治敏感,爱国心切,是满腔热血的青年知识分子群。如‘五·四”以来在许多爱国运动中青年学生起着先锋桥梁作用一样,他们也走在这次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蓄谋侵吞我国东北,青年学生以外的东北爱国知识分子,对日寇的侵略感受更深,他们历史地、最早地被推到了反日斗争的前沿。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爱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密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发动了有相当声势的反日斗争,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抗日救国的先驱。

(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

日本明治维新(1868 年)以后,资本主义有了显著的发展,并很快地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从 19 世纪末起,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吞并朝鲜、夺取中国东北、进而征服全中国、称霸亚洲的基本战略,即所谓的‘大陆政策”。

明治时期(1867～1912 年),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强迫我国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把朝鲜变为它的附属国;迫使清政府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 割让辽东半岛(后演变为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租借名义的独占）；攫取了从长春到大连的南满铁路和从安东(今丹东)到沈阳的安奉铁路的直接经营权 强迫开放凤城、辽阳、铁岭、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等 16 个城市。日本关东军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和辽南各地，成为我国东北南部的霸主。大正时期(1912～1925 年)，日本在我国东北策动“满蒙独立”，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包括：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增加修筑铁路和开放商埠权；延长旅大租借地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期为 99 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东部有土地租借权、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日本独占汉冶萍公司；不准中国将沿海岛屿割让给第三国；必须聘请日本人为政治、经济、警察、军事顾问，且人数要超过其它外籍顾问的总数。袁世凯垮台后，日本借给段祺瑞政府巨款，助长军阀战争，更深入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并同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军大批开入满蒙，控制了东北和蒙古的广大地区。后又出兵山东，强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到昭和时期(1925 年以后)，日本更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27 年 7 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制定“对华政策纲领”，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对于日本是“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不能不对之持有“特殊的考虑”；“决心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第 102 页。)1929 年末，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各国，日本也受到严重的冲击。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帝国主义急切地要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而此时的南京政府忙于反共内战，无暇顾及东北，又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极好时机。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 10 时 20 分，日本守备队“炸毁”沈阳

以北柳条湖南满铁路一段，诬赖中国军队所为，随即袭击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同一天，日本侵略军按计划占领了长春以南铁路沿钱安东、凤城、本溪、海城、营口、抚顺、铁岭、四平、公主岭等主要城市。19日，攻陷长春，20日进入吉林。1932年1月3日和2月5日先后占领锦州、哈尔滨，3月1日，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从此，我东北大好山河完全被日寇践踏在铁蹄之下，三千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过程。

日本帝国主义能够如此迅速侵吞东北，是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推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密谋侵略东北已久，蒋介石南京政府不仅不做任何准备，竟于1931年6月将东北军主力调往关内参加剿共，削弱了东北边防。1931年6、7月，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煽动战争狂热，全国各界反日呼声强烈。然而蒋介石却于7月23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说：“惟攘外应先安内，……不先剿平叛逆，完成国家统一，即不能攘外”（《大公报》，1931年7月27日）。并在此前后，亲率30万军队，举行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1931年夏秋，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和调动，事变即将发生。而蒋介石却在8月16日给张学良的铣电中指示：“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又当面对张学良说：“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你要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何柱国：《九·一八事变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6页。）“九·一八”日军炮击北

大营,东北军请示办法,蒋介石集团仍要当地驻军‘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说“: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中央日报》,1931 年 9 月 24 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日本帝国主义极大的鼓励,使得它能从柳条湖炸药响起,一日之间占领沈阳,攻城 20 座,略地千余里,四个月时间唾手而得东北三省。

为了迫使南京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并转移中国和西方各国对东北问题的注意力,日本帝国主义不等东北战事结束,又于 1932 年 1 月 28 日武装进攻上海。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鼐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上海抗战坚持一月有余,迫使敌三易主帅,未能越雷池一步。由于蒋介石、汪精卫政府蓄意破坏上海抗战,不给十九路军实际的援助,3 月 1 日,日寇终于在浏河偷袭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退。5 月 5 日,南京政府同日本侵略者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承认日本军队永久停驻吴淞、闸北、江湾等广大地区 南市、浦东不驻中国任何军队 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至苏州河止的广大地区,由日、英、法、美、意共管 取缔全国抗日运动 ;十九路军调离上海。

“九·一八”事变迅速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成为中国人民的紧急任务,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立即斥责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分别发表宣言,9 月 22 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之后又多次发表宣言和告民众书。深刻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恶目的和反动本质,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

地政策之产物”(《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 年 9 月 22 日。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1—154 页。),严厉地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指出正是国民党政府无耻出卖民族利益，才使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的罪恶企图得以顺利实现；号召广大民众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革命的民族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后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及广大党员，迅速地行动起来，发动群众性的抗日运动，组织抗日游击战争。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的时候，神洲大地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涛。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违背国民党政府的意志,自行组织起抗日武装义勇军(到 1932 年秋,东北境内义勇军人数达 30 多万)在辽北、辽西、辽东、辽南各地抵抗日军的进攻，袭击日军占领的城市，破坏其交通运输，同日寇展开殊死的搏斗，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奏响了英勇悲壮的序曲。 1933 年热河沦陷以后，日寇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分别击溃抗日义勇军各部，各地义勇军的斗争先后失败。在义勇军兴起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沦陷的东北发动群众，创建了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对日作战，牵制日本关东军的主力，给日本侵略者极大的威胁，直到东北光复。

“九·一八”事变后,工人阶级举起了抗日斗争的旗帜。在东北，当日军占领沈阳和辽宁主要城镇时，沈阳兵工厂工人和本溪、抚顺、鞍山等大钢铁厂和矿山的工人,安东丝织、辽阳纺织工人，北宁铁路和南满铁路工人纷纷罢工。抚顺煤矿工人因抗日被枪杀，安东工人同日本工头发生武力冲突。辽阳纺织工人与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满、北宁铁路工人自动组织义勇军，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上海，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轮装卸搬运货物。上海日商码头、驳船的全体中国工人、船员、水手一致退职。内外棉等23个日商纱厂工人全体退厂，组织救国会、义勇军，声明“为讨日之最前锋，任何牺牲在所不顾”。上海各业50多个工会团体，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出兵抗日、对日经济绝交，通电‘国家存亡，危在旦夕，我全市80万工友悲愤之余，决心与国偕亡。’(《申报》，1931年10月3日。)南京、北平、无锡、青岛、广州、太原、长沙、重庆等地工人，也都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汉口市商会、上海市商会，北平、郑州、武汉等地工商业者用‘经济绝交’、‘查禁封闭日货’、‘捐献救国’的爱国行动，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九·一八”事变后，最先奋起战斗，作为伟大抗日斗争先锋和桥梁的是广大青年学生。他们怀着满腔热血以强烈的献身精神，走在这次运动的最前头。

(二)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运动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各地青年学生立即行动起来。他们义愤填膺，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建立抗日团体，组织义勇军，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收复失地。9月21日，一批在北平读书的东北学生，成立了‘敢死队’，决心以身报国。北京大学学生发表通电提出：‘当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作政府后盾。’上海复旦大学、复旦中学举行‘九·一八’报告会，千余名师生起立举臂庄严宣誓：‘予鉴于国患日亟，誓自今日献身于国，终吾生努力

以恢复民族之光荣，抵抗外力之侵略，不践此言，国人共弃。”（《申报》，1931 年 9 月 22 日）南京中央大学组织反日救国十人团，每天日出时宣誓：“誓以热血，誓以赤心，誓以至诚，牺牲身家，牺牲一切，以扑灭侵略我祖国之敌人，以复兴我光华灿烂之祖国。”（《申报》，1931 年 9 月 28 日。）9 月 23 日，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发表宣言，联合全国同胞“以民众的力量来督促政府，抵抗那不共戴天的日本帝国主义”。（《时事新报》，1931 年 9 月 24 日）翌日，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了。

9 月 26 日，“上海大学联”组成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留校学生罢课声援。要求“国府集中兵力，驱逐日军出境”；“令张学良迅速出兵”；惩办不力外交官”；发给学生枪械，使一国学生武装起来”；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27 日，上海大学联代表团又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两次请愿均无满意答复，上海大学联决计发动组织更大的赴京请愿活动。

9 月 28 日上午 9 时，南京中央大学千余名学生，冒雨奔赴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提出政府应向日本下最后通碟，积极备战以及撤换外长王正廷等八项要求。又转赴外交部请愿，外长王正廷避而不见，且骂学生胡闹，遭到一个学生的武力惩戒。上午 10 时，中央大学学生、金陵大学学生和刚刚到达南京的 800 名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以及上海大学联代表，计 5000 余人，冒雨集会于国民党中央政府门前。学生们衣衫尽湿，满腔悲愤，又提出“惩办失地之东北负责长官”；“不得再抱不抵抗主义”；“由中央通令全国军队布置国防”；“驱逐日军出境”等要求。蒋介石对学生的请愿行动横加指责，说学生应以“冷静”的头脑应付

困难;‘如果浮躁气太甚,不过增加国耻而已”。9月29日,上海各大学赴京请愿的大队人马,交通、暨南、光华、持志、同济、大同、法政、震旦等大学和中国公学、同文书院、上海美专等校3000余学生到达南京。蒋介石威胁爱国学生影响政府的“政治与外交之筹划”,使‘敌人反得有扰我懈我之余地”;‘贻反革命派以利用之机会,,(《申报》,1931年9月30日)9月30日,上海大夏大学学生抵达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重弹老调。上海大学生从9月26日起所进行的接连不断的请愿,形成了学生赴京请愿的第一次高潮。虽然学生的历次请愿均未得到满意答复,但它表达了全国人民坚决抗日的意志,对蒋介石统治集团和日本侵略者是一种强大的震慑。在请愿洪流的冲击下,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被迫辞职。驻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也急电泊驻下关的日舰派出80名日兵上岸保护。

1931年11月4日,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将军在嫩江桥抗战。一日数电南京请求支援。全国人民密切地注视马占山部抵抗日军的战斗,深深地为他们孤立无援的处境担忧。但直到11月中旬,蒋介石政府仍一兵不发。为抗日援马,全国各地学生又掀起了规模更大、气势更烈的第二次赴京请愿高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批知识分子流亡关内,其中青年学生近万人。9月27日,流亡关内的东北著名爱国人士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等,在北平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东救会”),流亡北平的东北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踊跃参加。11月初,东救会组织‘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赴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请愿团620人,以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学生为主,有各界民众参加。公推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为总指挥,11月10日到达南京,翌日晨即列队到国民党中央请愿。

蒋介石不肯接见，请愿团冒滂沱大雨追寻，一直到下午 3 时，才在中央军校把蒋找到。请愿团代表慷慨陈词，恳请蒋介石率师北上“克日收复东北失地”。蒋介石却答以“对外交涉，政府自有办法，人民不应过虑”。请愿团对蒋介石进行了尖锐激烈的诘问、斥责，高呼“请中央领导抗日！”“收复失地，打倒不抵抗政策！”等口号。蒋介石见群情激愤，搪塞说“到必要的时候，中央一定抵抗。”（《王化一日记》，1931 年 11 月 11 日，转引自《“九·一八”和“一·二八”时的抗日运动史》，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1 年版。）

11 月 18 日南京各校抗日救亡会组织全市大中学生万余名，又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请愿。要求武力收复东北，扶持抗日救亡运动。

迫于国内各界民众及国民党内要求抗日人士的压力，11 月 19 日蒋介石代表四全大会主席团做报告时，表示他个人决心北上、效命党国。第二天，国民党四全大会也议决“请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同志迅即北上，保卫祖国，收复失地。”（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F），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4 页。）为督促蒋介石抗日，各地学生抓住时机，发动送蒋北上运动。11 月 23 日，上海大、中学联发动各校自由组织代表团去京督促政府出兵。24 日，就有 800 余名上海学生在火车站等候上车。25 日，南京中央大学抗日会举行“欢送蒋总司令北上”大会。同日，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北平等地大中学生到南京者已有两万多人。26 日上午，上海各大学督促政府对日出兵请愿团队伍来到国民政府门前，高呼“督促政府出兵！”“蒋主席立即北上！”“援助马占山！”“全国民众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中执委于右任被推接见，请愿学生坚持在国民政府门口等候蒋亲自接见。迫于学生

的压力,也为了分化学生的力量,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礼堂只接见上海43 所中学的学生和苏州、无锡、常州的请愿学生,指责上海大学生的行动越逾常轨,为少数反动分子做工具。夜幕降临,国府门外等候蒋介石的学生队伍越来越大,南京学生、清华学生、上海中学生请愿团也先后加入进来。上海警钟会会员,从前一天晚上,就将一口警钟悬挂在国府门口,日夜轮流敲击,督促政府出兵。黑夜里,万余名请愿学生不怕凄风苦雨,斗志昂扬,高唱各自的校歌,不断敲击警钟,鼓舞士气。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蒋介石终于在 27 日下午在国府二门大厅的台子上露面。还是威胁学生不要受反动分子所利用,指责请愿条件中有不合理、逾越常轨之点。学生代表要求蒋介石首先答复到底何时出兵北上,蒋急于摆脱困境,搪塞说:"三日之内出兵,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学生代表要求写下"手谕",蒋介石借口手边无笔墨,悻悻退去。

1931 年 11 月 26 日,日军进攻辽西和锦州,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出兵,竟向国联建议把锦州划为中立区由列强共管。至此,广大学生清楚地看到了蒋介石在用空话和谎言欺骗国人,逐渐失去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丢掉了对蒋介石的幻想。他们觉悟到请愿已达不到出兵抗日的目的,需要有更高的斗争形式,来推动抗日运动。

北平学生首先组织示威团,南下示威。12 月初,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 460 人抵达南京。12 月 5 日,举行游行示威。他们在南京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北""反对接受国联决议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当队伍走到成贤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前时,遭到早已布置的武装军警的阻拦和殴打,30 多人被打伤,185 人被抓走。被

捕学生一致决定，在恢复自由之前全体绝食以示反抗。两天后，国民党政府派 1500 多名武装军警，将被捕学生强行押上火车，送返北平。

12 月 4 日，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大同中学等 9 校千余名学生，也发起了南下示威活动。铁路当局奉令拒绝学生乘坐火车，各校代表卧轨抗争。学生们怀着挽救国家危亡之热情，在严寒的冬夜，卧于冰冷的铁轨上，不断高呼‘打倒卖国贼’等口号。翌日晨，北平师大、法学院、中国学院、铁道学院、艺术学院、女一中、艺文中学等校又有近千人，分批赶来参加卧轨。北平市长周大文劝学生回校读书，遭到严词拒绝。

7 日晨，北平军政当局被迫为两千余名示威学生开出了南下的列车。12 月 14、15 日，北平学生两千余人在南京举行了两次大示威。15 日，在外交部示威时，外交部内空无一人，学生们愤怒地摘下门口招牌，捣毁办公室门窗，把一叠叠卷宗扔到地下。同日，北平学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示威，要求蒋介石接见，又遭军警鸣枪镇压，10 多人受伤，5 人被捕。

国民党当局 12 月 5 日镇压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以后，上海学生就发起了声援北平学生抗议当局暴行的斗争。12 月 9 日，上海大、中学联开会请北大南下示威团代表报告“一二·五”事件真相。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陶百川率便衣特务，当场绑架北大代表许秀岑。凶手王福生来不及逃走，被学生当场扭住。学联随即组织队伍，营救被绑架的北大同学。上海交通大学 500 名学生首先奔赴枫林桥上海市政府。光华、大夏、法政、复旦、两江、美专、江南、商船、暨南等院校学生以及留日学生会 5000 人也先后赶到。学生队伍包围市府大楼，要求市长张群释放北大学生许秀岑，惩办肇事凶手，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在空中回响。在大队学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静坐示威的同时，部分代表前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找陶百川要人。学生代表冲开上海市党部大门，捣毁办公室门窗和用具。张群为缓和学生情绪，派秘书长去公安局“查询”凶手下落，宣布“停职查办”上海公安局长陈希曾；“通缉查拿”陶百川。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也派人前来施加压力，请愿学生不为所动，在市府广场上彻夜不散，上海市民从精神上物资上支援坚持斗争的学生，送来面包、开水、棉被、毛毯，成为学生爱国斗争的坚强后盾。10日晨，复旦、大夏等校学生声援队伍又一批批涌来，与广场上的同学汇合。学生们终于迫使困在市府内近20小时的张群释放被绑架的北大学生。学生们还强烈要求严惩凶手和主使人，并随即成立民众临时预审法庭，对凶手王福生进行公开审判。凶手王福生在学生义勇军的押解下出庭受审，供认全部事实，在审讯笔录上按了手印，证人也当众签名盖章。民众临时预审法庭还决定通缉主使流氓行凶绑架的前公安局长陈希曾和市党部常委陶百川。第二天，《申报》、《新闻报》等大报均报道了民众法庭预审凶手王福生的经过，刊登了民众法庭悬赏缉拿陈、陶二犯的布告。在铁的事实面前，国民党当局受到社会的谴责，狼狈不堪，张群向南京政府呈请辞职。上海学生的爱国风暴，令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丧胆。

就在各地学生成立示威团联合办事处筹备在南京举行总示威的时候，蒋介石统治集团阴谋策划了对爱国学生的残酷镇压。12月17日上午9时，上海、南京、北平、济南、安庆、武汉、无锡、苏州、太仓等地两万余名学生，在中央大学操场集合，开始总示威。示威大军浩浩荡荡经中山路、鼓楼、山西路，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行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不抵抗主义！”“收复东北失地！”“反对摧残民众抗日运动！”的怒吼声响彻整个南京城。中午

12时，示威队伍到达国民党中央党部，只见铁门紧闭、戒备森严，学生们愤怒地向里面扔掷石头砖头。下午 4 时,到达国民政府,见到的同样是闭着的大门,学生在愤怒中推倒了岗亭。一部分学生行至珍珠桥附近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馆,掀下报馆招牌,冲开大门,推倒印刷机,砸碎广告,割断电线,捣毁办公室和排字房。在学生将要离开报馆的时候,早已准备下的国民党警备二旅的士兵和大批警察,以密集的冲锋队形,向学生们包围过去。手持木棍的士兵大喊大叫冲上去,带枪的士兵对空鸣枪,警察用木棍、刺刀、麻绳,殴打、刺伤和捆绑学生。不到 10分钟，百余名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35 名学生被捕。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学生杨桐恒,头部、胸部被刺伤后,落入珍珠桥下河流中牺牲。翌日凌晨,国民党警卫军第一师第二旅、宪兵第二团第一营及首都警察厅保安队两个中队，包围各地学生的主要集中地中央大学。将机枪、火炮架于操场,胁迫中央大学以外的各校学生按校在操场集合,分上车船,即刻回校。学生们愤怒地斥责国民党当局所为。中午,北大、北师大、北平工学院、北平民国大学近千名学生,济南 2500 名学生,上海千余名学生,被强行押送至浦口、下关,用火车送回。安徽学生用小火轮押送回籍。为防范南京学生开展斗争，军警包围中央大学时，附近街道戒严，两架飞机低空盘旋散发传单,宪兵团也移驻中央大学,卫戍部队铁甲炮车沿街巡逻,南京城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珍珠桥血案后,学生抗日运动并未停止,在国民党高压政策下,继续进行不懈的斗争。

东北、上海、南京等地大中学校,在“九·一八”事变后,都建立了学生义勇军的组织。1932 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上海和各地学生义勇军，奔赴淞沪战场配合十九路军作战。 1932

年 1 月，寒假留校的复旦大学几十名学生义勇军组织了寒假特别军事训练班，到江湾附近的十九路军驻地随营受训，准备参加抗日战争。“一·二八”战事一开，复旦大学义勇军接受十九路军第 156 旅旅长翁照垣的指挥，到闸北、吴淞一带进行战地服务。他们在战区市民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召开战区市民大会，通报前方战况，散发战地简报，激发市民的爱国热忱；在苏州河一带，刷出大幅标语“为和平而战”“为正义而战”“拥护十九路军对日作战”；登记、保管、分配慰劳品，为自愿前来参加战地服务的汽车队编号、分组、押运，维持战地交通；为志愿参加抗日敢死队的居民和失业工人登记；根据群众举报，对敌探嫌疑对象进行审查等等，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抗战力量。不久，上海中国公学、法政学院的学生义勇军也前来参加，这支义勇军改编为十九路军随营义勇军第一大队，调至沪宁路沿线进行抗日宣传，在那里撒下了抗日救国的火种。中央大学的 800 余名义勇军，1932 年 1 月为准备北上杀敌收复失地，改名“铁血军”。“一·二八”抗战暴发，他们停止北上，开赴淞沪战场效力，也归 156 旅翁旅长指挥。2 月 13 日奉命开往吴淞潘家宅，担任警戒工作。日军登岸来袭，“铁血军”出面应战，奋不顾身地将敌击退，4 人牺牲，10 余人受伤。3 月 4 日，十九路军撤守第二道防线，“铁血军”誓与日寇决一死战，无肯退者。后奉命开驻唯亭训练，改编为十九路军随营义勇军第三大队。东北冯庸大学“九·一八”后撤至北平，为参加马占山部抗战，也在学生中组织了义勇军，聘请教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校长冯庸率领暂留北平的百余名义勇军，南下援助十九路军抗战。2 月 12 日抵真茹，由十九路军司令部分配在浏河防线，协助部队修筑防御工事，抵御日海军陆战队登陆。3 月 1 日晨，日军在浏河强行登陆。冯庸大

学义勇军与驻防浏河的第五军并肩作战,直到全军被迫撤退,才随军撤出阵地。学生义勇军在淞沪战场上,声援和鼓舞十九路军浴血抗战，他们自己也受到实际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战争的磨炼。

(三)东北抗日救国的先驱

20 年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独占中国鲸吞东北的步伐。1919 年,日本将驻屯东北的侵略军命名为关东军,设关东军司令部,加强在东北的军事力量。相继,在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附属地遍设警察机构,加强直接镇压东北人民的工具。在东北各地遍设领事馆和领事分馆，强化领事裁判权，侵犯中国主权,压迫东北人民。同时,加速对东北的商品倾销、资本输出、强占民田、毒品销售和贩运……。1925 年郭松龄反奉后,日本借口援助奉系军阀张作霖,调驻朝鲜的部队大肆增兵东北,把原设于辽阳的日驻屯军第十师团司令部迁至东北的政治中心奉天省城，将驻公主岭的骑兵一部开进奉天担任警备。为了独占东北，1927 年日本强迫张作霖签订《满蒙新五路协约》,全面攫取了东北的铁路特权。同年,动用武力强行在非商埠地且无日侨的临江设领事分馆。1928 年，多次发生日本守备队寻衅殴打中国公民和捕杀中国公安人员事件。1929 年，日本强行拆毁我北宁铁路支钱一段,摧毁车站和派出所。同年还越界横行,进入市区侵权设岗。1931 年 4 月，进一步策动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径表明,东北危在旦夕了。

在东北山河岌岌可危而奉系军阀政府交涉无力的形势下，东北各阶层爱国人士痛切地感到,只有组织起来,发动民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反对日本的侵略，才能捍卫国家主权。 1927

年 5 月至 10 月，曾先后掀起大规模的反对日本临江设馆和反对满蒙交涉的反日运动。东北爱国知识分子“痛灭亡之无日，急交涉之紧急”，于 1929 年 7 月，联合商、工、学、宗教各界组织了以反帝反侵略为宗旨的“国民外交协会”。该会在以后的两年中，开展了许多活动，积极地从事民众宣传和国际宣传，研究对抗侵略的办法，参与事件的调查，督促当局进行对日交涉，严防和检举卖国汉奸，进行国民教育，成为东北人民反日爱国的核心。“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爱国知识分子首先起来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发动社会力量，给东北各地纷纷兴起又处境艰难的抗日义勇军实际的支援。阎宝航、杜重远、高崇民、车向忱等人，是“九·一八”前后东北反日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

阎宝航（1895～1967 年），1917 年毕业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主张教育救国，认为要复兴中华必须兴办教育，启发民智。1918 年同友人在沈阳创办免收费用的“奉天贫儿学校”，招收贫儿近千名入学，在社会上获得很高声誉。阎宝航在师范读书时曾加入基督教，1920 年被聘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他以这个身份，组织社会问题研究会、时事讲演会，举办文艺活动，宣传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同时结交上层人物，同张学良成为莫逆之交。1923 年，阎宝航开始接触共产主义，以后逐渐靠近共产党。1925 年 5 月上海发生“五卅”运动，为声援上海的反帝斗争，阎宝航以“奉天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在沈阳组织了数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1928 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出现群众性的反日运动，阎宝航等联络各社会团体成立“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被公推该协会主席。20 年代以来，日本浪人在满铁附属地大肆贩卖毒品、设立吗啡馆，毒害国人。他又同辽宁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辽宁

省拒毒联合会”,任总干事。组织学生协助警宪搜查毒品,一次即焚毁价值百万元的‘海洛因’等。为进行反日宣传,他主持‘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发动千余名沈阳大中学生,利用假期到各县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阎宝航的爱国反日立场,引起日本驻沈阳总领事的注意,多次向东北当局“抗议”。“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阎宝航化装逃往北平,联合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杜重远、卢广绩等,发起组织以‘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常委兼政治部长。组织领导赴京请愿活动,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广泛地募集钱粮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1933 年‘塘沽协定’以后,国民党政府加紧镇压平津抗日救亡运动,东救会被取缔。阎宝航与高崇民、杜重远等联合东北军抗日将领秘密成立“复东会”,被举为理事长,继续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复土的工作。1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0 月 11 日阎宝航和高崇民赴上海探望被关押的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联名上书张学良,劝告张停止剿共,一致对外,保存实力,准备抗日。1936 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为营救张学良,阎宝航奔走于宁、沪、奉化之间,三次去溪口见蒋介石。为了协调北方的东北各救亡团体的爱国活动,1937 年 6 月阎宝航等在北平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年抗战期间,阎宝航在重庆积极从事上层统战和筹措经费,支持抗日救亡活动,继续领导东北人民抗日复土斗争。

杜重远(1899～1943 年),1917 年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1923 年归国后,在沈阳创办肇兴窑业公司,后又办瓷器厂。1926 年,日本要求在东北各县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